

屈原问题论争史稿



黄 中 模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屈原问题论争史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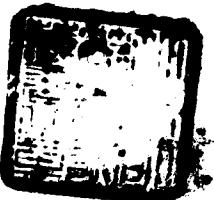
黄 中 模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13911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1113911

内 容 提 要

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，他的“金相玉质”的诗篇、“发愤以抒情”的文艺思想、浪漫主义的艺术方法，对我国两千多年的文学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，也引起过不同时代、不同观点的学者和文学家长时期的论争。

本书以这些论争为内容，以探讨屈原的文艺思想为重点，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，论述了自汉迄清的有名的学者和文学家对于屈原问题的论争，并就屈原作品的艺术特征，进行了较有系统的研究，是一部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进行论述的屈原研究史。书末还附有引用的各种书目的版本说明。

本书材料丰富，观点鲜明，立论深刻，语言流畅，不但有一定的学术性、理论性，而且有较强的知识性。

屈原问题论争史稿

qu yuan wen ti lun zheng shi gao

黄 中 模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广 益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200.000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5,000

ISBN 7—5302—0035—6/1·36

书号：10326·104 定价：2.20元

作者介绍

黄中模，1933年生，四川省重庆市江津县人。196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，长期在北京广播学院、重庆师范学院等高等学校讲授中国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等课程；并从事文学评论，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、《楚辞》的研究工作。现在是重庆师院《楚辞》研究室主任、副教授，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会员、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。已出版的著作有《郭沫若历史剧〈屈原〉诗话》、《沁园春词话》，并发表了文学论文多篇。

序

姜亮夫

屈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株大树，是汉民族文艺的总的根源之一。而屈子本人又是以爱国忧民而至于惨死，造成了千古奇悲，是使顽廉懦立的一个大典范。欧洲十字架上钉死一个耶稣，成为欧洲文化发展的因素。汨罗江中死了一个屈原，使中国文化多了一分精英；更使中华民族能屹立在全人类的行列里。这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也是人类历史的骄傲。两千多年来，许多民族英雄、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以屈原作为学习的榜样；到了现代，屈原又成为“世界文化名人”，受到世界人民的称赞。只有极少数人有异议，甚至欲把屈子这个人从历史上消除。这是对屈子的侮辱，对中国文化史的否定，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。因此，研究屈原本人和历代研究《楚辞》著作的工作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。

上：三家论

从对《楚辞》的研究与通评屈文与屈子的评论和分析情况看，我用“三家”来叙述《楚辞》研究方面的历代情况，用“二体”来叙述通评方面的历代状况。

所谓“三家”，具体说来是：（甲）义理家，是略陈或详说

每篇每章乃至每句的大义理论。(乙)音义家，是说《楚辞》章句、词汇的字音、意义乃至文字异同的是非等等。(丙)考证家，是指对《楚辞》一事一物、乃至一语一词的考据，以定其是非得失的。

这三家的法门，是历代研究儒家经典的不二法门，都在我们治学方法上起决定性的作用，而历代的盛衰各有不同。如两汉经师郑康成、孔安国、郑众、马融、许慎、王肃，乃至何休、杜预等等，莫不皆然。此法在研究诸子诸史及一切集部也都使用，而历代又都有部分发展。如佛教经典有经音义，于是经史各书也从释文角度加详了“音”之一端，而又能音义并重。唐人修定五经正义，于是历代许多典籍也有了音义笺疏并详加疏正的正义这一种形式。宋以后，除传钞外有刊本，刊本错误多而有校勘。我们试贴近《楚辞》而论，王逸《章句》是以义理为主而略兼注音释文一类；到郭璞注《楚辞》，引《山海经》、《淮南子》入说，而考据渐兴；到隋释道宣，注音分量特别加多；王勉专为《释文》、与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相同；洪兴祖依仿郭璞，朱熹加重义理；而吴仁杰的《离骚草木疏》又突出名物考释。明人好发议论，有黄文焕、刘献庭诸家之说兴。清代三百年，各方面也都有专书，这是与乾嘉小学翕翕相关的。

(甲) 义理家。在“三家”里的音义家、考据家，其说以务实为重，不容易只凭口说而至乖真义。惟有义理一家是容易异说蜂起的。所以历代“《楚辞》学”也以此一家为最庞杂。这，我们不能简单从事，总得清理一下他们的脉络才能得到结论。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。

这一家的议论，应当以对于屈原作品的探求为本。因为

汉赋诸家都是屈子支脉，不过是拟其辞令，离其风义的摹仿之作。所以这里只以屈子二十五篇为议论的出发点。

历来说到屈原赋的义理，从刘安、司马迁、刘向、王逸、班固、刘勰，乃至明清以来的学人，甚至近代学习之士，都喜欢按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诸子九流，把屈子附会为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杂家。真是五花八门，其实都很肤浅。好象一个文学家非儒即道，非墨即阴阳。当然要在二十五篇中寻几句同于或类似儒、道、名、法家的话，都寻得出来。

其实《艺文志》的九流的内容，说的都比较明白，而定名有的不太妥当。譬如儒本术士，儒家则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他有什么术？道家只不过有一部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首冠一个道字（依最近发现，汉初写本及敦煌隋唐写本卷子，是《德道经》，不是《道德经》）。况且屈子是个文学家、政治家，凡一切文学、政治的著作，都以反映时代要求为第一要义，如何能以一个学派限制他的一切？他的文中，如《离骚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，偶有与儒言相近处，《远游》有似“道士”说（非所谓正流的老家也），遂曰儒曰道，这到底是尊重屈子，还是诬蔑、戏弄屈子？这是值得注意的。大体一个作家，往往因年龄差异而思想有转变。我们看鲁迅先生的《域外集》，他译述厨川白村等人的著作，也只能说反映了鲁迅的前期思想；我们看章太炎先生的晚年议论，显与中年以前大异；焦循也指出孟子的早年、晚年之异（详《孟子正义》一书）。一个思想家自然很伟大，一个大艺术家也自有其伟大处，不必附著某家某派以自重。

但历代注屈文的人，确实一点也不假，多说屈子是儒家。如王逸、朱熹，乃至刘献庭都是如此。而班固则是彻头彻尾

以儒家偏见来论屈子，连求一死也遭到他指责为“忿怼不容”。屈子真死得冤枉！其他比附道家、纵横、阴阳家之说，也颇有人在，不必费笔墨去一一论证了。

又汉代赋家有一种说法，以为屈子善于讽谏，这虽不肯定为什么家，其实也是儒家的分支。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承认屈子有怨愤之情？孔子不也有兴、观、群、怨之说吗！这大概是受汉武帝表彰六经的影响之故。

宋明以来，有的人借古讽今，不得意之士，往往以屈子自况。这本来是汉人手法的延展。如王褒《九怀》、刘向《九叹》，颇宗屈子辞令。但至明人，此风大盛，而黄文焕为最，其《听直》发挥此义为最直切，其中以忠爱为基，其实也是儒生之见呵！

凡此种种，都是受封建宗法社会的影响。

到了近百年，中国政治上的激荡，亡国破家的忧忿，影响到了文艺理论上的破旧立“新”。有的破坏者可能是为了自建“学说”，如廖季平、胡适之等。及浅薄者为之，乃欲以刘安代屈子。异说纷起，都是些心中无“主”、欲邀时宠者，其攀援廖胡，欲成大国，实在无甚价值，徒使异国学人迷罔而欲在中国文化史上销除此一代大家。这与我也曾参加讨论的“大禹”“是个虫”的论争有些相似。“大禹是虫”论一出，国际上一些人便利用来缩短中国史年代，妄图从文化上压低中国。这也是件不能不带上一笔的事。

但从另一方面说，近世的新学说——一切社会科学的乃至自然科学的新学说传入中国后，对屈原的研究，着实也有些新的现象，有的渐成专业，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学、民俗学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研究方法。这才开始有了真正

对屈原思想的分析。

总的说来，在现代的潮流里，才开始有真切的思想方法的分析。在此以前所讨论的，有的论点只不过是在整个中国旧文化史上的正统思想中，捞了一把稻草来横渡大江而已。有的人把屈原打扮成一个什么家，以畅其意，割一脔而成一家之说，有的人妄臆说以图一点什么（譬如有人如说屈子是个“弄臣”，也有人说是个“巫者”）。在一般人心目中所不能完全捉摸得到的大池子里，池水已搅浑，谁还能认清是非？于是吠影吠声，遍及全国，远到海外。这在文化战线上，古今中外也是常见的事。但一遇到真理，必然是彻底垮台的。自近世科学昌明，民族学、民俗学为研究文化者所接受，是会盛开一次大花的。

用民族学、民俗学来论屈子思想的本真者，启蒙于梁启超先生、谢无量先生、鲁迅先生，继之而渐见昌明。到近些年来，一些有识之士都已在使用这一法门。譬如汤炳正先生以苗疆祭祀事迹说明《招魂》一些字，用马王堆的资料加上历来的墓兽说明“土伯九约”。又如孙作云先生以马王堆帛画说明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中不可思议的怪物。我也学着用金文中的甲子吉忌说明《离骚》的庚寅。近二、三十年来讲《楚辞》的人，已开始试用此法探讨屈赋。这是件极可喜的现象。肖兵同志以神话学说来说明屈赋的成绩，我们不能因为他年事较轻而不加以重视。

我十分相信以这一学理（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民族、民俗学）为基础猛勇前进，必然能冲破旧传统文化的镣铐，从楚民族自己的文化特点来解析屈赋，必然能大大排除一切不正确的分析，使我们的文艺批评得到进一步发展。

“三家”中的“义理家”，是“三家”中的重点。

(乙) 释文家。释文家是以注音、训诂为主的学派，起于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；后世有单论音的，如隋释道骞《楚辞音》。也有用“释文”一词的，如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所引王勉《释文》。宋人校勘之学大兴，用若干个本子来整理一个本子，如洪氏《补注》、朱熹《集注》中所引用的诸本。及清末，其事益密。如毛氏的《校文》、刘师培的《异文考》、闻一多的《校补》，都是这一类的成书。此事是读书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。校好一个本子，不读误书，是读书人的幸事，也是整理古籍的第一著要事；只在所据版本的善恶与多少，此外没有什么大乱子。

(丙) 考据家。这是考据文物制度草木鸟兽的考据之学。这在屈原赋的研究中，是一件不可少的工作方法。王逸《章句》中，也有一些对文物制度的解说，但所谓考据之学，在两汉还未大兴。愈到后世，此事益繁。譬如草木鸟兽等，有吴仁杰的《离骚草木疏》，这还只是一种注述之学，是考据的初步。明清以来，考据之学往往为义理服务。如周拱辰的《离骚草木疏》，胡文英的《屈骚指掌》，都是企图从民俗中对某些草木认为善，或为恶，以探讨屈赋中使用草木的含义。此外如地理、文物、工艺等，也都各有专书，这是一类朴实之学，无花色可谈，也不易与其它条件相关涉、相接合。此处可不必多言。

下：二体说

上篇所讲“三家”，都是就《楚辞》、主要是屈赋这部古籍的整理与研究而言，是一种“务实”之学，这是一切整理研究

工作的第一步功夫。这些功夫都不能渗入丝毫个人“成见”，只能是根据事实，以求文字语言、文物制度，乃至于一句一章之真。在这里面也可能有些“争论”、“异论”，但求归于“是”，是谓实事求是之学。

但自从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问世以后，文章有序总述全篇大义，文中章有章义、句有句义。这些也只不过是文章串解后的总结，阐明章句篇什大义而已。而从刘安《离骚传》到班固序骚以来，有一种“抽象”的评论，或一言两语，或短章小牍，对屈赋各篇、屈原其人进行评论。其中有些人用一种似乎近于鞠狱的判词断语，有的甚至不顾全貌只就一点一滴的感受而“狂言”。其中自然也有如刘勰的《辨骚》等文，似当别论。其它如扬雄《法言》、刘向《新序》、王充《论衡》、应劭《风俗通》与范晔、庾子山诸人乃至杜甫、李白、孟郊、李商隐、李贺的诗句中，莫不有之。到明代讨论者极多，如蒋之翘等集为七十二家、八十四家。在评注《楚辞》的专著中，有一类如朱熹的《楚辞辩证》、蒋骥的《楚辞余论》等，具有较强的理论性，为数不少，成绩也颇大。这使我们看到了五光十色的评论，觉察到屈子的文艺被一切学士文人，得播与发挥得可观，应引起我们的十分重视。这种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“务虚”之学，确有许多能启发人们的见解。这是我所以要来谈谈这类理论性的“务虚”之学的原因。现在姑且就两事分论：一为评文；二为论人——即论屈原其人。

(甲) 评文。这是《楚辞》研究中的一枝新花。历代评论《诗经》乃至《春秋》、三传、《尚书》的文章，是很多的。至于评屈赋，则似乎以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为最早、最切实，而且也提得最高。《屈原传》说：“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

“非而不乱，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……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（这话或说是刘安的）这话有两个要义：一是第一次把《离骚》与《诗经》有机地联系起来，既开了后世论骚的一个法门，又把中国文学史上的南北两大系统合流；二是提高对屈子主要作品的评价，“与日月争光”，达到了自然美中最高的光明境界，是历史上最高的评价，对后世有特大的影响。前者发展到了《文心雕龙》，刘勰多方面阐述，把“辨骚”与“尊经”并列，而论述最为翔实。这一条线索，为历代评骚的基本方法。此后六朝、隋、唐、宋的文学家的论述，都用此义，各以其所习闻了解发而为评论，到明代而被辑录为七十二家或八十四家。这些虽然是一鳞一爪的东西，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，一个提纲。后来由于评点派的影响，在许多评注《楚辞》的专著中，往往有夹注夹评的，其中有些著作也有很强的理论性。如黄文焕、清代桐城派的姚莹等人的著作，就是如此。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。我们可以即此而扩充之，是件必要的不朽的胜业。至于后者，如司马迁说的“可与日月争光”之义，已将屈骚提到了最高点。后人无可超越。

（乙）论屈子。屈原其人，历来都成为“文人”推崇的对象，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。但也因他参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活动，以至于把生命都丧失了，所以也成为政治上争是非得失者所借古讽今，或指桑骂槐、指鹿为马的一切人揭榜的好材。第一个是贾谊，他以长沙王太傅为《吊屈原赋》。从此一切不得意于时政的人，获罪于政治的人，也都借这位大师以发泻其胸中不平之气。但也有人依傍班固、颜之推等人的“露才扬己”、“显暴君过”的说法来非侮他。这些非侮他的人，或者是别有苦衷，或者是别具心肠之徒，于是把屈子说成是“小

人”之流。我们不能以“百家争鸣”来原宥这一学派的罪孽，应当加以严格分析，严格批判，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冤狱应当彻底昭雪。到近代以来，有四川井研廖季平先生与胡适等人，为了他们的学派，说了点失于深思的话，为国内狂人、浅人钻了空子，也影响到国际上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，于是有种种不实之论强加在屈原身上，以侮辱屈子，至今还未肃清，是非常令人不满的。

我们要结合国内已开始显露头角的新的社会科学，马列主义，乃至许多自然科学，来整理这一文化史上的业绩，继承前人评论屈赋的遗产。另一方面要对文学批评史上评骚领域中的污染，大力揭发，大力洗刷，肃清对伟大诗人的诬蔑的流毒。

我怀此心愿已有若干年，但由于我的体力已随年龄增长而日益衰退，记忆已日益丧失，而目力不济，更为忧心。去年，黄君中模来杭就学，带来了他在前不久写的一部《屈原问题论争史稿》，恰巧是我想到的必不可少的一种书，我看了很高兴。觉得这是一条新路子。尤其使人难忘的是那坚实的、有真知灼见的一个论点：“发愤以抒情”是屈原的文艺思想的核心。这个论点，借鉴于文化传播而来的“愤怒出诗人”这句最强固的有文学创造性的理论。他从这句话得到了启示，提出了屈子说的“发愤以抒情”，体现了屈原对诗歌抒情特点认识的自觉，不同于儒家的文艺思想。这作为一个主要论点，不仅把以北方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”之说来评屈子的陈言否定了，而且屈文中许多不甚可解的词句，也都可解了。（其实，这在中国历代的评论家中，也有相似的意见。如李白诗所谓“哀怨起骚人”，与“愤怒”云云有“同义”之处。而李白这句

诗，除了受到屈原的影响之外，他用“哀怨”二字，还是中土古老的传统基素，是孔门的“哀而不伤”、“怨而不怒”及“诗教”中的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等思想综合而得的。这种综合体，文人学士久已习闻，不太兴感了。这同杜工部评李白诗所谓“飘然思不群”，也还隔一间，能明言“思不群”，即指明李白思想解放。的确在中国历史的习惯势力下，能作到这点是大不易的事。而“愤怒”二字，其含义更鲜明、更强烈，又不仅于“不群”了！于是他把屈原说的这句话，作为一个生机契合的思想来分析中国历代的评骚理论，总结了历代屈原问题论争中的规律，拨开了在评骚史上蒙盖着的创作论（那些北土儒家文艺思想与“诗教”说等）的云雾，觉得处处是新义。而且本书材料系统而翔实，与理论结合起来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为了进一步提高质量，我鼓励他努力修订。他在深入钻研《楚辞》的同时，又作了必要的订正与补充，修改得令人满意，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的理论性和科学性。这使我感到他与我三年前所培训的十几个同志，都是我老来最得意的朋友。他请我为此书作篇序言。我想，为他介绍一下，对这一课题是有作用的。便根据中国研究《楚辞》的情况与他已有的成就，两者结合，用上篇列举大要，然后用下篇来说明对屈赋评价的规律与意义，对我来说，也自己总结一下个人的认识。但上篇分量多，有些喧宾夺主现象，好在现在写文章不必过分考究什么体制，所以不管它。至于盼望对一切读他的书的人有益，则是老年人的很自然的心境了。

一九八三年元月六日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序 | 姜亮夫(1) |
| 引 言 | (1) |
| 第一章 屈原问题论争发展的轮廓 | (6) |
| 第一节 屈原问题论争的主要内容及其经历的几个阶段 | (6) |
| 第二节 形成长期论争的几个基本原因 | (14) |
| 第三节 研究屈原问题论争的意义 | (19) |
| 第二章 屈原文艺思想的核心——“发愤抒情”说 | (22) |
| 第一节 从“愤怒出诗人”的理论看屈原“发愤以抒情”的进步性 | (23) |
| 第二节 “发愤抒情”说体现了屈原对诗歌抒情特点认识的自觉性 | (26) |
| 第三节 “发愤抒情”说与儒家文艺思想的异同 | (32) |
| 第四节 司马迁继承屈原的文艺思想，发展为“发愤著书”说 | (43) |
| 第五节 屈原和司马迁的文艺思想对后代文学家的深远影响 | (48) |
| 第三章 反对屈原文艺思想的代表作 | (52) |
| 第一节 班固反对屈原“责数怀王、怨恶椒兰” | (52) |
| 第二节 颜之推批评屈原“显暴君过” | (58) |

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三节 | 孟郊指斥屈原“行为小人儒”..... | (60) |
| 第四节 | 朱熹责难屈原“过于中庸”..... | (65) |
| 第五节 | 明清时期拥护朱熹的评骚论点的代表作..... | (75) |
| 第四章 | 以反对班固、颜之推为中心的“主怨派”的文学理论 | (83) |
| 第一节 | 王逸重申“诗人怨主刺上”说..... | (83) |
| 第二节 | 刘勰的“《离骚》为刺”说..... | (89) |
| 第三节 | 刘知几的屈原“不隐恶”论..... | (93) |
| 第四节 | 李白的“哀怨起骚人”说及唐代诗人对屈原问题的不同意见..... | (97) |
| 第五节 | 屈原对宋代词人的影响与辛弃疾的“交疏怨极”说 | (103) |
| 第六节 | 晁补之、洪兴祖及章学诚等人的“《小弁》之怨”说 | (108) |
| 第七节 | 王世贞、赵南星和周拱辰等人批驳班固的代表作 | (126) |
| 第五章 | 以反对朱熹为中心的“主怨派”的文学理论 | (138) |
| 第一节 | 张京元、焦竑批评朱熹“不亦固哉！”..... | (138) |
| 第二节 | 黄文焕“与屈原同痛”、“驳朱以尊屈” | (141) |
| 第三节 | 陆时雍指责朱熹评骚是“痴人说梦”，提出“不平曰骚”说 | (150) |
| 第四节 | 王夫之肯定屈原“忧国怨深”，驳斥朱熹的“忠而过”说 | (153) |
| 第五节 | 鲁雁门反对解骚“尽本中和”，指责朱熹“论人迂刻” | (161)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六章 | 企图调和论争矛盾的评骚论点 | (164) |
| 第一节 | 一些诗人主张屈原“不是怨怀王” | (164) |
| 第二节 | 胡稳指责朱熹论骚是“于无过中求有过” | (170) |
| 第三节 | 林云铭否认屈原有“怨君”与“孤愤”之情 | (172) |
| 第四节 | 朱冀以“死守善道”论骚，要为屈原 辨“不白之厚诬” | (178) |
| 第五节 | 李光地提出屈原“怨愁奚施”的疑问 | (180) |
| 第六节 | 蒋骥以“好修”论骚，称屈原不是“轻 生以怨君” | (183) |
| 第七章 | 反对调和论争矛盾的代表作及其它 | (191) |
| 第一节 | 王士禛和一些诗人的主张 | (191) |
| 第二节 | 王邦采抨击论骚“七病”，反对“折中”说 | (195) |
| 第三节 | 金圣叹提出《离骚》是“忧患成书”，反对 “忠孝著书”说 | (199) |
| 第四节 | 鲁迅在《摩罗诗力说》中评论《离骚》的 真知灼见 | (203) |
| 第八章 | 扬雄的《反离骚》及其引起的论争 | (208) |
| 第一节 | 《反离骚》的主要内容 | (208) |
| 第二节 | 扬雄与班固论骚之异同 | (211) |
| 第三节 | 围绕扬雄评骚的论争 | (213) |
| 第九章 | 关于屈骚与南北文化的 继承关系问题的论争 | (221) |
| 第一节 | 汉代文学评论家的论争 | (221) |
| 第二节 | 刘勰论述屈骚的继承性与创造性 | (224) |
| 第三节 | 朱熹、黄文焕关于屈原是否“学于北方” 的论争 | (227) |